

多元文化语境中东干故事传说比较研究

张 冰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提 要: 中亚地区将 19 世纪以来定居吉尔吉斯与哈萨克的中国甘肃和陕西回族后代称为东干人。本文旨在探讨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对东干人这个特殊的复杂族群的来源及东干民间文学的发生、变异特点进行的独到的比较研究。

关键词: 多元文化语境; 东干故事传说; 李福清; 发生学; 变异体; 情节单元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中亚地区将 19 世纪以来定居吉尔吉斯与哈萨克的中国甘肃和陕西回族后代称为东干人。东干民间故事传说是俄罗斯汉学家鲍里斯·利沃维奇·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 1932—2012)院士汉学生涯最早涉足的研究领域。自上世纪 50 年代首次发表研究论文触及东干民间文学, 到 2011 年俄文版《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Дунган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и предания)增补本中文版在华问世, 半个多世纪间, 李福清搜集编选了一系列东干故事传说等民间文学语料文集, 对东干人这样特殊的复杂族群的来源及东干民间文学的发生、变异特点进行了全面的探究阐释, 探讨民间故事与文人小说、戏曲创作间的关系发展, 多元文化语境中民间传说故事情节母题、民间文学模式的生成变异问题。他采用情节单元比较分析原则, 在国际上首次将东干故事传说文本分解为一个个独立的情节单元结构, 进行相关体裁、题材的比较研究。

在李福清看来:“东干人民间文学较丰富。包括民歌、传说故事、笑话、谚语、谜语, 以前还有人知道一些戏曲。”(李福清 2011: 14)他从东干人那里首次听到被他们称为曲子的流行民歌——孟家女, 也因此有了他以后的首部研究论著《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问题》(Сказание о Великой стене и проблема жанра в китайском Фольклоре)。

许多中国大约已经失传的作品保留在东干人的故事传说中。“迁住到外国的一部分民族一般特别注意保存带来的风俗习惯与民间文学作品, 有时比在他们的故乡保存的还好。”(李福清 2011: 11)东干人传统的民间文学作品都是他们的祖先从中国带来的。李福清在青海、甘肃收集的民间故事集中就发现了流行在东干那里的故事, 如《人心不足, 蛇吞象(相)》等; 他也在东干人的曲子中发现了西北回族中普遍流行的曲子《阿哥马五哥》。

迁移民族对本族文化传统的继承表现在各个方面。李福清研究了东干人对散文故事的叫法, 一类叫 gujir (“古今儿”), 一类叫 fu (“书”)。指出:“古今儿”就是一般的民间故事, 来自于中国西北甘肃和陕西的方言对故事的称呼。东干人对这一方言的采用, 深刻地说明了他们深受祖先文化语境的影响。同西北地区的汉族人一样, 东干人把故事也理解成对古代和现代事件的叙述, 因此, “古今儿”的说法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东干语中。而东干人身处的俄罗斯文化语境中, 对“故事”则以“过去的事件”、“古时候的事情”为指称, 譬如

俄罗斯民众对“勇士歌”的述称 *strina*¹ 逐字译就是“古时候的事情”。这种祖先的文化影响，通过李福清对东干人来源地——中国西北以外“故事”指称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佐证。“中国的一些方言中，西北之外对故事还有其他的叫法。例如在江西南昌，故事被简称为‘古’，是‘古代’或‘很早的事儿’的意思。在厦门也称‘古’，在潮州也称‘古’，都是‘很早的事’的意思。我们看得出，这里强调的是对过去或古代事情的叙述”。（李福清 2011：21—22）

东干的传统民歌、谚语、谜语、传说故事是回族与汉族的共同创作。各民族虽宗教不同，风俗有区别，但民间文学的内容和体裁大多数是共同的，这是世界各民族的普遍现象。“如世界有名的《卡勒瓦拉》称为卡累利阿—芬兰民族史诗。前苏联南部摩尔达维亚人（现在是独立的国家，称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人语言大体相同，摩尔达维亚人信东正教，罗马尼亚人信东正教也信天主教与新教。他们的传统民间文学，如史诗也是共同的，成为东罗马史诗，民间故事也相同。”（李福清 2011：11）在李福清的研究中，东干民间文学与中国西北民间文学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中国西北流行的民歌——“花儿”或“少年”，就是东干人的“少年曲子”。中国西北地区流行的民歌《珍珠倒卷帘》在中亚东干人那里也非常流行。

但是，如果再考虑到“四句头”（*частушка*）是流行于俄罗斯文化特有的民间文学体裁，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西北流行的民歌“花儿”或“少年”，到东干人的“少年曲子”中便发生了“每四句一首”的变异，但是“少年曲子”也仍然异于“四句头”，与“四句头”整首四句都关乎同一叙事的情节结构不同，“少年曲子”的“头两句与第三、四句并没有关系”显然，迁移民族文化的生成、演进和发展，在对本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中，不能不因其迁移地新的文化语境，受到诸多外族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作为“移居民族”的东干（回族）民族构成复杂，其中以北方民族占多数。除了与“汉人的交融以外，还包括了伊朗人、突厥人，甚至可能还有满族和蒙古族的成分”。“在东干人民间文学当中，甚至一篇故事里，我们不仅会遇到远东和中亚民间文学里的怪异形象，而且会遇到近东—中亚神话体系中的怪异形象”，“如故事《秃子》就提到佩里女国（刚好也是近东和中亚民间文学中的角色）的几座大门，一座由凶神——巨人歹乌子守卫，另一座由妖魔古怪守卫，而第三座由野人鬼（即野人的鬼魂）守卫。歹乌子出自伊朗语言，是指伊朗神话里的可怕的多毛巨人，吃人的恶魔，是专门害人的”。（李福清 2011：9，31）

口头文学所具有的变异特点是公认的事实。“所以民间文艺学家，认为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差别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变异性’（或者说‘异文’）。”（钟敬文 1988：8）李福清的贡献在于，他亲自到东干人居住地进行村落调查、村民走访，记录第一手口述文本，比较研究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民间文学理论，试图通过对东干人这样一个特殊的多元组合的族群，近百个故事文本的具体文学事实、体裁、语言、情节单元结构等等的阐释解读，阐述其民族的非纯粹性和跨文化语境的复杂生成变异，及其导致的文学的“变异”性。这不仅仅是进行简单的母题比较，“好几个母题合起来还不会变成一个民间故事”，（李福清 1988：7）“故事的任何一个情节离开其它情节都无法进行形态学和发生学的研究”。（В.Я. Пропп 1928：126）因此，论及李福清东干民间文学研究，便不能不谈到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发生学问题。

“文学的发生学，是关于‘文学’生成的理论。”严绍璦倡导的比较文学研究意义上的“文学发生学”，主张“关注文学内在运行的机制，从而阐明每一种文学文本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的内在逻辑”，而“从文学发生的立场上观察文学文本，则可以说在‘文明社会’中它们中的大多数皆是‘变异体（variants）文学’，“在文学的‘变异’中所形成的新的文学样式（文本），都是本土文学传统的延伸和在另一层面中的继承”。（严绍璦 2011：67）严绍璦以文学变异体观为基本出发点，以“原典实证”构成基本学理的文学发生学理论

为我们认识李福清东亚民间文学研究的深刻意义和价值，提供了极好的理论观照和探索视野。

李福清不仅在《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中编著有 68 个东干故事传说，还在书后附录的一百余页的长文《故事情节比较研究》、《未收入本集中的故事情节》对每个故事情节，以及未收入该书的其他 18 个情节结构，进行了发生学意义的实证文本的系统、翔实的比较阐发。其文章“东干故事传说情节的来源和分析”的俄语原文便是“Источники и анализ сюжетов дунганских сказок”。

在其亲自参与记录，也是列为全书第一篇的神奇故事《张大杰打野鸡》的研究中，李福清注意到，中亚东干人普遍流行的这个神奇故事情节在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汤普森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池田广子的《日本民间故事类型与母题索引》、崔仁鹤的《朝鲜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及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都有迹可循。这个故事情节更是存在于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与中亚回族的祖先们生活在一起的汉族、藏族、撒拉族、蒙古语系几个民族（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人、甘肃的东乡人、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等其他各民族民间文学中。“远东文化圈中的其他民族，从中国西南的佤族到最东边的日本民族，也同样有这类情节。有时也能在菲律宾，在土耳其发现这一故事系统的扩散的余波。不过在形式上已发生很大变化，在菲律宾是从这一方面，在土耳其是从那一方面完全被改变了。”（李福清 2011：23，383）

只在《张大杰打野鸡》一篇故事中，李福清列出的情节单元“异文”，就有几十种之多，也显示出他研究的重要特点：从大量丰富的材料出发，并找寻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方法。谈到自己的这部东干人故事传说编著，李福清曾说：“我自己阐发了一种特殊的文本分析原则，将每个文本分解为一个个独具意义的情节单元，其中某些便是一个个母题。然后对每个极小的情节进行比较研究。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都尚属首次。”²从最小的情节单元入手，李福清将东干人的这个故事传说中包含的若干情节母题与这些“异文”逐一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出其生成规律。譬如：

东干族中这类故事中独特的“青白蛇搏斗”母题，“故事主人公帮助白蛇”的情节，使得其有别于汉族原来的故事文本。它常见于中国西北回族等少数民族故事传说中，但在汉族和中国东部、南部的其他民族故事中或者完全见不到，或者形式上已经非常弱化。“而且变得更接近于邻近的突厥—蒙古语系民族的故事，这些民族就是西北省份中与回族和陆相处的撒拉族或东乡族，还有最西边的一个突厥民族——土耳其族，他们也有白蛇与黑蛇斗争的母题”。他说：“东干族同这些民族在遗传上并非都有联系，但是他们既然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就必定有许多世纪的密切文化（民俗、民间文学）交往，只是对此还没有作过专门研究而已。”（李福清 2011：23）在东埔寨或土耳其，这类情节的异文则一再提到中国，提到中国皇帝，用以替代中国民间故事中常见的龙王，同样与其是以远东的中国境内为中心向四外传播有关。而东亚其他各族异文故事中这一情节，因为海上捕鱼业的强势，则“异化”多与水域的主宰有关。同样，《张大杰打野鸡》中的另一母题——“有魔力的圆圈”的生成显然得益于中亚和西伯利亚的民间文学传统……

“没有正确的形态研究，便不会有正确的历史研究。如果我们不能将故事分解成一个个组成部分，那我们便无法进行正确的比较。而如果我们若不会比较，那又怎么能够弄清诸如印度和埃及的关系……”（普罗普 2006：15）

李福清进行的大量详实的文本和田野记述、“原典”阐释自成体系，独具特色。他在所做的 68 个东干人故事及未收入该书的 12 个故事包含的上百个情节母题的比较分析中，对很多民族民间传说情节母题特征提出独到之见，譬如：“在国库下面挖掘坑道和识别尸体”是东干故事中较为稳固的母题。李福清还直接提出很多具有相似之处的情节母题是否存在发生

学方面的联系问题；同时，在发生学意义上推断每个情节母题的原型和生成的地点；揭示出每个情节发展，意即异化生成的途径关联。他对上百个情节母题的异化生成研究表明：“文化传递的基本形态就是这样的——原话语经过中间媒体的解构和合成，成为文化的变异体，文化的变异体已经不再是文化的原话语。之所以有新文化（或新文学）文本的产生，不是为了重复原话语，完全是为了本土文化的需要。”（严绍璁 2011：67）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李福清在进行第 61 号传说故事《白袍薛仁贵》的情节比较研究中提出了“错合”（контаминация）概念。《白袍薛仁贵》是李福清在 1954 年在吉尔吉斯米粮川村从村民那里记录的唐朝统帅薛仁贵的故事。薛仁贵作为公元 6 世纪的唐朝名将，驰骋沙场，曾远征当时的高丽，天山地区的突厥部落等等，战功卓著，其传说故事广为流传。李福清认为，他记录的东干薛仁贵故事的情节异化生成，其实正是中国、蒙古、朝鲜等东亚各地相关传说故事和东干人常用的传说故事情节形式的错误融合。譬如，李福清记录的东干故事中薛仁贵把钱和朋友们喝酒花掉的情节，与传统的《薛仁贵东征》中他将钱都付给武术师的情节相悖，但是这种“错合”却符合东干民间文学的情节模式：主人公给朋友吃喝。李福清还逐一分析马伟林诺夫叙述的东干异文、清代无名氏的通俗小说《薛仁贵征东》、无名氏的戏曲《定天山》等历史文献、民间传说、小说文本、戏曲剧本中情节的具体表述和变异，说明东干人故事中薛仁贵杀死老虎，其他猎人与他争斗失败同他结拜兄弟的情节“十分可能看作是关于薛仁贵情节的各种异文的独特错合”。（李福清 2011：491）东干“异文”显然更多地体现着自身传说故事模式，以及勇士歌、史诗性等文化语境特征。“错合”一词源于《淮南子·俶真训》：“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闲。”李福清通过强调“错合是以两种场合中的行动同唐朝时代的关系来减弱主人公姓名的相似性”（李福清 2011：488），探讨多元文化语境中民间文学传递的生成变异，表明“在文学的‘发生学’的机制中，作为它内在‘异质文化语境’的文化传播的所有形式几乎都是在不正确理解的逻辑中进行的”（严绍璁 2011：67），其研究意义和视域已经远远超出了“文本”立场以及具体的情节结构、故事模式的比较阐释。

李福清对东干故事传说中众多角色形象的剖析也形象地表明了文学生成理论的“变异体”观。譬如，他对阿訇、喇嘛、和尚和道士等典型形象的研究，他说：“因为回族很早就信仰伊斯兰教，所以故事里应该也能见到阿訇这个人物。但情况并非如此，就拿本书来讲，只有几篇里面出现过阿訇。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奇怪现象，中国记录的回族民间故事阿訇这个人物较常见。由此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伊斯兰教观念和仪式对中国回族故事的影响远远超过对中亚回族故事的影响。这也许是因为，伊斯兰教是中国回族区别于汉族邻居的主要标志，正是与这种情况有关，宗教方面的内容才在其民间文学中得到一定的表现。而在中亚，回族住在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语系的民族中间，他们并不需要在自己的民间文学中强调伊斯兰特点。相反的，他们却追求对以前在远东的日常生活特殊风貌的描写。”因此，也不会奇怪“东干人故事中就有了喇嘛、和尚和道士”。这“并非源于喀尔喀蒙古语里对这个词的规定读法，而是源于另一种蒙古语系的语言，很可能是从甘肃土族话中借来的”，妖怪“猛蛊子”这一形象则“反映了不仅是蒙族的，也是藏族的多头怪物的观念”。（李福清 2011：27—31）

“变异体”观还体现于李福清东干民间文学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对民间故事与文人小说，戏曲创作间的关系生成发展的探讨。他以自己记载的东干传说《白袍薛仁贵》与章回小说《薛仁贵征东》、平话《薛仁贵征辽事略》和薛仁贵戏剧中的情节变异作比较，“发现了一些故事情节由平话演变为小说，从小说演变为说书，又从专业的说书返回到民间流行的故事这样一个有趣的循环发展过程”。（李福清 2003：2）在李福清看来，“改变为口头作品而进入民间文学中的有古典章回小说，也有话本小说，如《俞伯牙摔琴》，甚至还有传统的戏曲情节，像张羽煮海的传说。他们给所有的民间散文作品都烙上了特别的痕迹。古典小说的

口头异文有很多地方接近于民间故事特别是神怪故事，而同样地，故事又明显地受到其他散文作品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故事的某种生活化，表现为故事的全部艺术构思都有‘向生活靠拢的性质’，也同样表现为故事情节的话本化。这就引起主人公所扮演的角色变得根本不符合神怪故事的特征，也引起作者的立场发生改变”。（李福清 2003：38）

李福清在东干民间文学研究中还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看法。如：“东干族与汉族同有一个特点，一个故事情节在几个体裁中表现，但区别是东干人的民间文学没有像汉族那么多多种体裁，如汉族孟姜女有传说，民歌，弹词，鼓词，宝卷等等，东干人只有传说与曲子”。生活的真实与故事的“真实性”并不互相印证。“对叙事性民间文学来讲，文学艺术世界与现实之间在总体上表现出了不吻合的情况。”（李福清 2011：15，25）等等。

显然，李福清的研究具有追寻还原“本原本本”，阐发“异文”生成之“文化语境”的独到之处。因此，不仅研究实践上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文本，也在理论上为丰富和拓深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学生成理论的研究给我们以极大的借鉴和启示。

民间文学研究是李福清享有国际学术声誉最主要的学术成就之一。无论是他汉学研究兴趣的源起，还是日后其在中国古典文学、俗文学、中国年画及东方学诸方面的研究成就，及至他的融通中西古今的比较方法论，莫不与民间文学研究息息相关。

李福清 1950 年考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文学专业学习。为了学说汉语，大学一年级，1951 年夏天他独自来到了当时苏联吉尔吉斯斯坦加盟共和国境内的一个村子——米粮川，这里居住着东干人——19 世纪回民起义失败后从甘肃、陕西来的回族后代。在这里，李福清第一次听到老乡们讲述的《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等中国民间故事、民间传说和民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1953—1954 年他又专门到这里学习汉语口语，搜集民间口头文学故事，包括许多民歌、谚语，小孩子特别喜欢的谜语等等，并以此为素材写作年级论文和毕业论文，崭露头角。其中，四年级论文《东干人传统民歌的新材料》（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дун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песне）便发表在 1956 年第 5 期的《苏联东方学》（Совет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杂志上；五年级的毕业论文《中国成语、谚语和歇后语》，也运用了这些资料。这些民间文学故事传说为他日后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最基本的重要素材，1958 年，李福清在科学院第 27 期《东方学所简报》（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上发表了《韩信传说——东干人流行的中国历史传说之一》（Из дунгански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казаний: сказание о Хань Сине），将他在米粮川记录的传说与书面材料做了比较研究。“在此之前，除了广州 1929 年《民俗》周刊 66 期第 6—8 页，发表过张冠英《传说与史实——关于萧何、韩信的传说》之外，没有关于韩信传说的记录，我的记录可以说是最早的。”（李福清 2003：2）同年，在科学院《民族学所简报》（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этнографии）上也发表了《东干人流行的中国历史传说》（О дунгански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казаний）；1977 年，李福清和两位东干学者合作，选编了《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ир дунганской сказки // Дунган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и предания），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问世后，引起苏联国内外广泛关注，苏联的《亚非人民》（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德国的《本事》（Фабула）等都有专文报道，学术界对该书传说故事的“原汁原味”，以及李福清进行的情节结构分析原则等给予高度评价。2011 年，该书增补后，又经过中国东干语研究专家海峰教授对其中以俄文字母写就的东干语原稿转写为汉语，及连树声等人翻译，中文版在中国面世。

自东干人的民间传说研究开始，李福清的民间文学研究开始渐渐涵盖中国，乃至东方各族民间传说、故事、神话等各个方面，并长期在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等俄罗斯、中国高校培养汉学人才。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东方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学院院长伊里亚·谢尔盖耶夫·斯米尔诺夫教授已经断言了“一个有关中国民间创作研究的李福清学派”

的出现 (Б.Л. Рифтин 2012: 12)。

附注

1 starina, 即 старина (былина)。

2 参见李福清 2012 年 6 月 13 日给笔者的信。“Чжан Бин! Я очень рад, что Вы пишете про мой анализ дунганских сказок. Я сам разработал особый принцип анализ тест делится на отдельные значимые в сюжете единицы,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них могут совпадать с мотивами. И веду сравнение именно по этим мелким микроэпизодам. Такого никто не делал ни в России, ни в Китае. Я думаю, что на симпозиуме в Тяньцзине Вы можете сделать сообщение о моих дунганских сказках и принципе их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Мне самому кажется, что анализ Сюэ жэнь-гуя получился неплохим. Еще раз спасибо за внимание к моей работе. Ваш БР”

参考文献

- [1] Китай и окрестности. Мифология, фольклор, литература [M]. К 75-летию академика Б.Л. Рифтина. М., РГГУ, 2010.
- [2] Пропп В. Я., Морфология сказки, ЛЕНИНГРАД: «А С А Д Е М И А », 1928.
- [3] 李福清. 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
- [4] 李福清. “我的中国文学研究五十年” [A], 载李明滨编选《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 [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5] 李福清. 中国神话故事论集·作者自序 [M].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8.
- [6] 普罗普. 故事形态学 (贾放译)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7] 严绍璁. 比较文学与文化 “变异体” 研究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 [8] 钟敬文. 中国神话故事论集·序言 [M].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onggan Folklore in Multicultural Context

Zhang b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descendents of the Hui people from provinces of Gansu and Shanxi in China who have inhabited in Kyrgyzstan and Kazakhstan since the 19th century are called the Donggan people in Central Asia. This paper i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distinctive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Russian Sinologist Boris Lyvovich Riftin, who conducted his study of the exceptional ethnic origin of the Donggan people as well as the phylogeny and variants of Donggan folklore under a multicultural context.

Key Words: multicultural context; Donggan folklore; Riftin; phylogeny; variant; plot unit

作者简介: 张冰, 女, 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文学博士; 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 外文部主任; 兼任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中国高教学会理事, 中国俄罗斯文学学会理事, 中国外国文

论与比较诗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教育学会理事。

收稿日期：2013-06-22

[责任编辑：刘 锐]